

傅山文化丛书

纪念傅山诞辰 400 周年

范世康
主编

傅山 文选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纪念傅山诞辰 400 周年

傅山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张亨余 侯文正 选注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山文选注 / (清)傅山著;张厚余编注.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7.7

(傅山文化丛书/范世康主编)

ISBN 978-7-5378-2983-0

I. 傅… II. ①傅…②张…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I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4552 号

傅山文化丛书

范世康 主编

*

傅山文选

张厚余 选注

*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www.bywy.com

太原市天和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25 字数: 320 千字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378-2983-0

定价: 3391.00 元(全 8 册)



序 言

范世康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纪念傅山先生的丛书，旨在宣传傅山精神、弘扬傅山文化。

傅山先生是明清之际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书画家、医学家，1607年出生于太原市阳曲县西村（今属太原市尖草坪区向阳镇），到今年8月11日，正好诞辰400周年。400年来，傅山先生作为一代文化巨人，已经成为古城太原的一个文化符号。他扎根于百姓心中，声名远播于全国，甚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我曾有幸在傅山故里、太原市原北郊区担任过区委书记，亲身感受过傅山先生在基层百姓中那种历久弥新的影响。我曾有幸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观瞻到流落海外的傅山墨宝——赠别魏一鳌12条屏，领略了傅山先生在海外文化界的地位。近年来，由于工作需要，我还有幸接触过许多位国



家、省、市文化界的专家和学者，他们对傅山先生人格气节的敬仰和对傅山文化的研究和弘扬，更使我心存感动。确实，随着历史的推进，傅山文化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早已渗透进源远流长的三晋文脉，浓缩成为太原优秀文化的品牌。一座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壮大，文化名人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共产党太原市第九次代表会议提出，要把太原建设成为集三晋文脉与现代气息为一体的特色文化名城。我们今天纪念傅山先生，既是推动特色文化名城建设的有效举措，也是贯彻市九次党代会精神的具体实践。

传承傅山文化，首先要弄清傅山一生的思想脉络。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傅山先生，经历并目睹了明朝的腐败，经历并目睹了清初的暴政，也经历并目睹了康熙皇帝亲政以后重视中原文化的现实。为替恩师袁继咸辩诬，他赴京城伏阙讼冤，与朝廷的腐败抗争；面对清廷入关后圈地屠城的暴政，他与百姓一道奋起反清，直至入狱而抗词不屈；而一旦认识到走向大一统的清政府开始接纳并愿意传承中原文化之后，他一方面继续坚持拒不降服皇权、拒不入朝做官的原则立场不变，一方面则长期隐居故里读书行医，顺时顺势而谋，实践了先圣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处世哲理，为中华文脉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傅山先生一贯反对思想僵化而又充满奴性的理学，他认为，明朝之所以灭亡，便是因轻视民生而奴性十足所导致。他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他还在《读史》诗中指出“天地有腹疾，奴物生其中”。打倒奴性和倡导自由，是傅山一生的追求。为袁继咸辩冤后，恩师约他做官但他却坚辞不去，康熙皇帝让他做官更被他以死谢绝。但反过来，他却十分乐于为普通百姓诊疾看病，甚至遇到穷人付不起药费时，主动免费送医送药，帮助他们纾困解难。甘于在民间生



活而不求富贵，甘于潜心治学而不求闻达，始终关注民生，主张民主，促进民和，是傅山先生得以在生前为国人赞叹、逝后于中华文明长河中始终璀璨夺目的原因所在。

研究和传承傅山文化，还要学习傅山先生博学多思、包容古今、在艺术领域融会贯通、不断创新的胸怀和方法。傅山先生之所以能在多个领域均取得巨大成就，得益于他在治学中，对诗、书、画、医触类旁通，既不重此薄彼，又能借此而厚彼，从而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底蕴。明亡后傅山入山为道，但对佛、道、儒各类学说却从不偏重一家而排斥他人。“诗不如字、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是民间对傅山先生的一种评价，说明他具备那种吸纳包容和创新发展的博大精神。唯其吸纳包容和创新发展，其诗、其字、其画、其医才能源于传统而又不囿于传统。我们今天传承三晋文脉、构建特色文化名城，傅山先生这种包容治学、创新发展的精神，正是应该学习和发扬的。

“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总无心。”只要把握住傅山先生一生的思想脉络和治学精神，我们便可正本清源，在对傅山文化的研究、探讨和传承中，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切入历史，真正感受傅山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它的重要意义。

为纪念傅山先生诞辰 400 周年，太原市委市政府于今年组织安排了一系列活动。包括：举办全国书法艺术展、全国书法名家邀请展、傅山书法学术研讨会、傅山医学养生国际研讨会、傅山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上演新编晋剧《傅山进京》，摄制电视专题片《名士傅山》，建设中华傅山园等。编撰和出版这套丛书，也是系列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现在，由市纪念傅山诞辰 400 周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编辑、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丛书就要和读者见面了。其中有傅山先生《霜红龕集》水印本、傅山诗文选注、傅山书法



艺术展作品集和研讨会论文集,还有《太原晚报》“寻访傅山的足迹”专刊合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至 2006 年底,省城一些专家、学者宣传介绍傅山先生的散文、随笔选萃。作为对傅山文化的一种普及,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得到读者的喜欢。

是为序。



前 言

侯文正

历史学家郑天挺在《清史简述》中指出：“清初爱国文人很多，成就也不小。其中一派是反映人民疾苦，反映民族压迫的，这一派如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王夫之、归庄等是主流，值得我们注意。”由于傅山在哲学、医学和书画艺术方面的高度成就已经令人应接不暇，使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往往被淹没或忽略了。实际上，傅山无论在文学理论和文艺批评领域里，还是在诗、文创作实践中，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诗、文理论方面，他承担起时代赋予他的任务，批判了明代文坛上复古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逆流，上承李贽、公安派和竟陵派，下启叶燮、袁枚，总的成就至少堪与同时代的顾、黄、王并驾齐驱。如果就他那种大胆的、独创的、敢于向封建正统思想挑战的精神和在一些问题上（尤其是文学自身规律探讨上）所达到的高度而言，那么不但是明代文坛上各个流派的



理论家所没有达到的，而且清代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也没有人达到过。有清一代，在鸦片战争之前，在文学创作领域里兴盛的是小说、戏曲，在文学理论领域里放出异彩的是小说、戏曲理论和批评；而在封建社会的“正宗”文学领域即诗、文领域里，流行一时的是那些“神韵派”、“格调派”、“桐城派”，他们的理论主张与傅山的诗文理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就诗、文理论而言，傅山可以说是独步明清两代，是从李贽到近代诗文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在创作实践方面，傅山的大量诗文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时代感，闪烁着思想和战斗的光芒，其中一些传记作品、散文小品、杂文和抒情诗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与公认的明清两代第一流作品相比较毫不逊色。同时，他在戏曲和通俗文学方面也作了有益的探索。

傅山的诗、文创作不同于一般文人的创作，他的诗、文理论也不同于一般文艺评论家的理论。他是作为一个具有民族气节、关心人民疾苦的社会活动家，一个儒家封建正统思想的异端，去创作和研究诗文的。但他并非单凭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去“推演”或“构造”诗文的理论，而是深入地研究了社会与文学，才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的文学观，同他所处时代的现实斗争和他自己的社会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身历了明末的腐败，并经历了国破家亡的痛苦，痛定思痛，需要认真总结明代政治文教的得失，探病穷源，追溯到宋代以来的弊端，这必然要涉及文学领域。另一方面，明亡之际和之后，他面临着尖锐的民族矛盾，亲身参加了抗清斗争，需要运用各种武器进行斗争，其中当然也包括文学武器。他的丰富的社会阅历、深切的生活体验和现实斗争的需要，使他重视文学领域的问题，推动他深入地研究了文学的历史和现状。



首先,从他的著作和诗文札记中可以看到,他几乎研究过中国文学史上所有的重要作家和著名作品,诸如《诗经》、《楚辞》(屈原、宋玉、景差)、先秦诸子、《左传》、司马迁(《史记》)、扬雄、班固(《汉书》)、阮籍、刘桢、三曹父子、陆机、陶渊明、鲍照、谢灵运、谢朓、沈约、江淹、庾信、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韦应物、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等。他亲手选编过《左锦》(《左传》选)、《杜遇》(杜甫诗选)和《历代文选》,并加以评点。他对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也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他对大量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使他有可能对文学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产生比较深刻的认识。

其次,他还认真研究了明代文坛上各个流派的理论主张和作品。他反对他们标榜声气、意气用事的宗派门户作风:“不论河岳气,私各光焰豪。文人不相下,直不真文曹。针芥胶臭味,旗鼓权劲矛。”(《偶借法字翻杜句答补岩》)但又提出对他们不能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而要采取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不必谀,不必梗,商量发挥出手眼上之手眼”。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是“真正个中人,慧眼平心,可与何(景明)、李(梦阳)、王(世贞)、李(攀龙)、钟(惺)、谭(元春),共坐一堂之上,公公当当,做一树义调御师,令各家伎俩一齐放下,乃得。不然,任他辩才,总是偏见。作者有心,看者有心,作者有时,看者有时,变何易尽,论何胜腾!”(《与戴枫仲书》)明代以何、李为代表的“前七子”,以王、李为代表的“后七子”,以钟、谭为代表的竟陵派,是在“正宗”诗文创作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向不同方向探索出路的产物。但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却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歧途。傅山平心静气研究了他们的得失,在同复古主义、形式主义斗争中发



展了自己的理论。

再次,傅山还密切地注视着明末清初的当代文坛。他不仅关注着顾炎武、李因笃等人的创作,而且编选了《枫林一枝》、《旷林一枝》、《西北文选》等山西的当代作品,还团结了一批青年诗人,如胡庭、雪峰等。他对民间戏剧、小说和民歌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

正是在此基础上,傅山形成了他的文学观,主张文学应该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和人生疾苦,应该经世致用,为现实斗争服务;强调文人的气节修养;同时,在文学的内部规律方面,研究了文学的审美价值与感情特征,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与独创性,文学创作过程中的思维特点,文学成就、风格与作家性、情、气、才、学、识等主观素质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他虽然没有留下大部头的、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但却在《失笑辞》、《书〈文赋〉后》、《杜遇余论》、《诗训》、《文训》等专篇文章及大量序跋、杂记中,发表了许多使人耳目一新的精彩见解。为了叙述的方便,下面就其文论与诗论及其创作实践分别作一介绍。

傅山在《哭子诗·哭文章》中,集中地揭示了他的文论的核心内容:

法本法吾法,吾家文所来。
法家谓之野,不野胡为哉?
相禅不同形,惟其情与才。
尔每论天机,不知所自偕。
《平准》《货殖传》,举笔即萦回。
不韩亦不柳,连拈而安排。
沉著武侯书,质实《大诰》该。
明白中原檄,琐屑金华哈。



一扫书袋陋，大刀阔斧裁。
 号令自我发，文章自我开。
 岂有王霸业，润色于舆台？
 珥笔多长离，能当此气摧？
 此气顿已矣，奴撰仍尘埃。
 中原卷天风，一烬祖龙灰！

这首诗简直可以说是一篇“文坛改革”的纲领性宣言，讨伐统治文坛的理学“奴撰”、形式主义与复古主义的檄文。诗中明白宣示了傅山文论的要点：一是主张文章要经世致用，如《史记》的《平准书》、《货殖列传》那样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著作，如《尚书·周诰》、诸葛亮的著作、逐鹿中原的檄文那样的文章，这同理学家“文以载道”的主张及其“奴撰”是明显对立的；二是主张“号令自我发，文章自我开”，注重独创，反对复古主义的模拟、因袭；三是主张文章要不掉书袋，不事雕琢，不落定法格套，沉着、明白、质实，反对形式主义；四是强调创作过程中的“天机”、“才情”，注意到文学本身的规律，这也是针对理学家和复古派的。

傅山强调文章要经世致用，重视“文”的社会作用。这是针对理学家空谈义理、复古派脱离现实的文风而来的。傅山说：“宋人之文，动千百言，萝莎允长，看著便厌。”（《杂记五》）这里根本的问题是内容空洞，言之无物。就连唐宋两代较多地接触一些实际的古文大家，傅山也有所不满：“韩、柳、欧、苏，文章妙矣，然终觉闲话多。”（《杂记一》）尤其是明代以来八股取士制度的推行，把许多本来可以有所作为之士，引入追求功名利禄、脱离社会现实的死胡同，使“文事武备”暗吃其亏，这是傅山最痛恨的。他在《书成宏文后》深刻地指出：



仔细想来,便此技到绝顶,要他何用?文事武备,暗暗底吃了他没影子底亏。要将此事算接孔孟之道,真恶心杀!真恶心杀!

傅山这段话,可以说是明清之际对八股文最现实、最尖锐、最深刻的批判了。

他对历史上的两种文人进行了对比:一种是虽居南阳草庐,却关心天下大事的诸葛亮,终于辅佐刘备成就了大业;另一种是饱读经书、富于典故的谯周、郤正,却无法挽救蜀汉的危急,只能为蜀主刘禅起草降表。傅山把后一种称为“文章士”。这种人的“文”是难以经世致用的。理学家、复古派利用韩愈“文以载道”的口号,打出来作招牌,把韩愈作为“文章士”的“北斗”。傅山在《历代名臣像赞·韩文公》中对此加以驳斥:

北斗泰山,起衰八代,人无间然知公徒以文。论诸道兵不堪用;佐晋公时入汴说韩弘协力;廷凑之变,慨然入镇,教语动悍藩、复使命,可仅目以文章士乎?肤论之士,辄与扬雄并称,殊非伦……世人之不知文章生于气节,见名雕虫者多败行,至以为文行为两,不知彼其之所谓文,非其文也。

傅山认为,韩愈是不可“仅目以文章士”的,因为他有气节操守和政治军事才能,尤其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排危解难,有补于时世。

傅山强调文章要经世致用,还体现在他对史传文学的特殊重视上。傅山写给戴廷栻的信中说,“兄所留心者,莫过纪传之事为急”,要他学习古文辞要“专专于《史》《汉》中求之”。纪



传之事，“急”在何处呢？一方面，当时有许多忠于明王朝的“死节”或抗清志士，急需立传，传之后人，以激励斗志。傅山赞美《左传》如“古锦”，千古以来光彩焕发，并由此想到：“奇人非巨笔，千古少生气。以此叹弱翰，厥任亦弘毅”，“不得龙门才，英雄受经纬”（《览息眉所颠倒宋书王镇恶传叹息有作》）。他希望能有写作《左传》、《史记》的巨笔来谱写当代的抗清英雄。另一方面，他也想利用史传文学的特殊作用，“奉天讨伐，拨乱反正”（《五代史》），强调汉族王朝及“大一统”的正统地位，宣扬民族主义，鼓吹抗清斗争。

傅山主张文章要敢于独创，不要被所谓“法度”束缚，不要去拟古、雕琢，坚决反对复古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逆流。明代复古主义者与道学家讲道统、称孔孟，互相呼应，在文学上宣扬一种历史退化论，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李梦阳更是主张彻底的拟古，他认为：“夫文与字一样。今人模临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耶？”（《空同集·再与何氏书》）复古主义者如唐宋派还强调“文字法度规矩一不敢背于古”，并总结了一套拟古的法度，诸如“照应”呀，“虚实”呀，“疏密”呀，“开合”呀。结果，他们无不是从古代书本上讨生活，在形式、技巧上做文章，造成了诗文创中模拟、因袭、剽窃和严重公式化的恶果。傅山针锋相对地批判了这种主张，他说：“字与文不同者，一笔不似古人即不成字，文若为古人作印板，尚得谓之文耶？”（《家训》）他在《失笑辞》中进一步深入地批驳了理学家和复古派这一套令人作呕的“麀糟之奴论”。他很幽默地作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把代代相承而又代代变化的文学比做天空中不断变化的云彩，“揽青天之片云”，观察一番：



且道此云为邱、索、坟、典之云耶？抑先秦、两汉之云耶？盖太虚无印板，丰隆有才情，时非先秦、两汉矣，云实无异于先秦、两汉；时非典、坟、邱、索矣，云不全乖于邱、索、典、坟。氤氲变化，无古无今，无模拟之天使，图彩本于皇神。何物主理也？何物主气也？何物照应也？何物法度也？

当代之“云”，并不是云神丰隆用“印板”按邱、索、典、坟时代或先秦、两汉时代的“云”印出来的，也不是什么“天使”从“皇神”秘藏的“彩本”模拟出来的，但仍然是“云”。那么当代的“文”不模拟古文，不为古人作“印板”，就不成其文了吗？文学是发展变化的，是要靠“才情”去创造的。既然如此，那么理学家和复古派之所谓理”、“气”、“照应”、“法度”又算什么呢？为什么非要死套这些“法度”呢？傅山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复古主义的影响在诗文创作中造成的恶果：

乃有拘士，掉罄故纸，拟之而为言，有本以为期，是亦穷雕镂之工，亦烂组织之斐。有识者视之，如以金玉锦绣厚瑁璠枯骨，盖徒敦笃其己能，而不知其文之夭死也……此无他，以其心手之气近尸气者多也。

这段论述也是相当深刻的。“拟之而为言，有本以为期”，专门在故纸堆中讨生活，是复古主义的特征；“穷雕镂之工”、“烂组织之斐”，专门在词章结构上下工夫，是形式主义的特征。二者结合起来，就是把古代的枯骨披上华丽的外衣，没有一点生气，是“夭死”之文。傅山还在《费眼打油示少年》一诗中挖苦这种人，抄袭、剽窃古书，就像小偷一样，“穿窬复掩藏，不中冷眼矚”，只能骗骗妻子、奴婢：“妻子见握卷，公然推坏璞；

奴婢见作文，‘主人好才学’。不如不识字，天全其五凿。”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如明代唐宋派的几位文章大家，也不免陷入公式化、雷同化的泥途，如傅山所批评的：“王（慎之）、唐（顺之）、瞿（佑）、薛（论道），文章妙矣，然只觉惟有格套而已。”

当然，反对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并不是反对借鉴古人和讲究作文技巧。傅山曾教导他的两位孙子，从《左传》中学习“文章之妙”：“至于文章之妙，大段大段，细曲细曲，铺张组织，补缉波澜，前人多少评论，总不能尽。尔小子若有眼色，读之既久，自得悟入，别生机轴，依傍不依傍，薰习变化，全非我得与尔拈出者”（《家训》）。既要“悟入”，又要“别生机轴”，既要“薰习”，又要“变化”，这才是正确的态度。这是进行文学创作的基本素养之一，但决不是为了拟古或陷入公式化的格套。

宋明理学家站在卫道士的立场上，以六经为准则，去衡量一切文学作品，时而“奴评婢讥”，喋喋不休，竭力禁锢和扼杀文学；时而又说为文就是“玩物丧志”，企图根本否定文学。傅山针对性地对他们的迂论作了抨击。例如，对优秀的史传文学《左传》，宋儒朱熹、尹焞都曾加以攻击，傅山驳斥说：

我于《左传》薄有所得，却非明经家言，只是醒得文章之妙。朱晦庵谓是“趋炎附势之书”，不知何为而为此言？尹廌说：“只有六经，如《左传》，便把文章做坏了也。”真令人喷饭。尹廌醒得文章是个甚来了（《杂记二》）

对《左传》这样文学性较强但并非异端的书，理学家都无法容忍，对《山海经》和《庄子》这样的“奇书奥牒”，在他们眼里就更加荒诞不经了。傅山却把庄子与六经相提并论，把《山海经》与《尔雅》相比，充分肯定了它们的价值：



庄子为书，虽恢谲佚宕于六经之外，譬犹天地日月，固常常经常运，而风云开阖，神鬼变幻，要自不可阙。古今文士每奇之。顾其字面，固是周末时语，非复后世所能悉晓（《读〈南华经〉》）

《山海经》不但物类奇瑰，即文字之古峻，皆后世文人所不能拟肖。或曰：荒唐之言也。余曰：平实之理无足駭，少所见多所怪，见橐驼言马肿背，如此辈人，举世皆是也。故《山海经》之义息矣。以《山海经》为不可信，《尔雅》亦不可信也。历代史载方国出产，以为真耶？妄耶？故通儒奇士，而后可读《山海经》。读《山海经》已难其人矣，而况读《庄子》乎？以实为诞矣，能以诞为实乎？（《书〈山海经〉后》）

理学家不但容不得《庄子》、《山海经》，而且也容不得一切具有美学价值和感情色彩的文学作品。他们以“劝百讽一”作为否定文学创作的口实，要求把文学作品写成宣传封建纲常伦理和仁义道德的语录讲义，即便偶有描写风景的文字，也要“曲终奏雅，邀之三王与夫礼乐”。傅山挖苦他们说，按照这样的标准，只有像朱熹那样“取史策秽事，尽力播扬”，声嘶力竭地谩骂攻讦，才是“文章”；只有像景差那样态度谦恭而作品拙劣的作家，才能使那些“诚意正心之贤”满意。而像《招魂》这样的名作，虽然写出这样感人的名句，“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但由于没有“曲终奏雅”，在理学家看来也只能落得“目中道德仁义之柴遂焚”的评价；而像宋玉的作品，沾染了艳情艳色，在理学家看来，更是属于思想迷乱狂放，“可谓径情而拙媒，遂不能与景差同为圣贤之侪矣，奈何哉？”傅山以轻蔑的口吻，对理学家的这种“奴评婢讥”给以讽刺，并抓住他